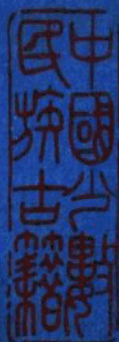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 土家族古籍之四

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主编 彭勃等 辑录 / 祝先注 选注

历代土家族文人诗选



吉首大学图书馆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 土家族古籍之四

历代土家族文人诗选

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主编

彭 勃 等 辑录 祝注先 选注

岳 麓 书 社

辑 录 彭 勃等

选 注 祝注先

责任编辑 吴泽顺

彭继宽

杨锡光

封面设计 胡 颖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 土家族古籍之四

历代土家族文人诗选

彭 勃 等辑录 祝注先 选注

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 主编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银盆南路87号）

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发行 长沙当代印刷厂印刷

199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58 千字 印张：10.5 印数：1—1000

ISBN7—80520—282—6

I · 158 定价：5.50元

出版说明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是在国家民委和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指导下，由各省(区)在广泛搜集的基础上分别加以整理、翻译出版的。湖南的民族古籍属其中一部分。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50种少数民族，481万人口，分布在全省各地。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民族古籍文献，是伟大祖国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1986年的初步统计，土家、苗、侗、瑶、白、回、壮、维吾尔等民族有各种古籍300余部，从不同的侧面生动地反映出各民族丰富精深的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思想、观点，以及绚丽多姿的文化艺术。

党中央、国务院对整理出版民族古籍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国务院国办发(1984)30号文件中指出：“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我省已拟定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近期和长远的规划，从1986年起对省内各民族古籍有计划地进行抢救、整理，并有选择地陆续出版。这对于我们加深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丰富民族学的研究，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社会思想史；增强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
领导小组办公室

序

祝注先老师送来《历代土家族文人诗选》一书的稿本，要我为其作序，阅读以后，深受教育启发，因此，我非常乐意从命。

湘、鄂、川、黔四省接壤的边地，是毕兹卡（土家族自称）几千年来繁衍生息之所。这一地区，和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时土司管辖的地域大体一致。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共有土家族571万多人。他们居住的巍巍武陵山，气势磅礴，风光绮丽。是地灵人杰呢，还是人杰地灵？毕兹卡因武陵山而日进其勇其文，而武陵山亦因毕兹卡而愈显其神其秀。

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土家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1957年才被正式确认。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今天是昨天的延续。历史不能割断、不会割断，也无法割断。毕兹卡的存在，既有着今天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情风俗的文化特征，自然也可追溯到古老的历史渊源。

土家族的聚居区虽属崇山峻岭，却和中原华夏文化最发达的地带毗邻连接。这样一种地理条件，在两种文化彼此映照、交相融会的过程中，华夏文化自然起了主导作用。土家族的上层人物，在长期地与历代封建王朝保持着密切的隶属关系的同时，接受了汉文化的深刻影响。“改土归流”以后，汉文化大量输入，更促进了毕兹卡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显著进步。就整体而言，土家族可以说是一个与汉民族接触早且进步较快的少数民族之一。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的决定，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列为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的国家重点项目。《土家族文学史》是这一项目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湘、鄂、川、黔四省有关单位和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体编写人员的辛勤劳作，这部43万余字的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89年顺利出版。这部书的出版，正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所指出的：对于清理文学遗产，促进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填补我国文学史建设中的重要空白，认识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发展历史中许多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对于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繁荣民族文化事业，以及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代土家族文人诗选》是《土家族文学史》的配套产物。选注者祝注先副教授出生在沅江下游，是喝着这条发源于土家族地区的武陵山脉的河流的乳汁长大的，自小接受了楚巫文化的熏陶，对于土家族人民和土家族事业具有天然的深厚感情；他又是《土家族文学史》的编委，承担了古代文人部分的撰写与定稿，于土家族文学的研究，一直潜心伏案，辛勤笔耕，曾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广东民族学院学报》、《广西民族研究》以及四川《民族》等杂志发表过数十万字有关古代土家族文学的论文，可谓志有所专，业有所精。现在，他经过六年的苦心探研，从五千余首历代文人的诗作中，筛选出了这个本子，不但从配合文学史的角度看很有必要，而且具有着保存典籍的深远意义。这本书所提供的资料，过去有人在论述中零星提及，由此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比较缺乏系统而深入的探究。祝注先副教授如此精心遴选，又另加注释和解说的作法，在土家族文学史上，还是首举。因此，这本书的面世，对土家族的文化建设事业来说，可以说是一项填补空白的

工程。我想，这本书既有利于一般读者阅览、鉴赏，则必将受到500多万土家族人民的欢迎，而对研究土家族的人士和朋友来说，也许可以从中摘取材料、获得启示、扩大视野。

我相信读者们会从这本书中获得知识，找到乐趣，因此，我热烈祝贺这本古籍的出版，并对祝注先同志的工作表示赞扬。

王双林

一九九一年五月

前 言

有人不无幽默地说土家族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说它古老，早在先秦时代，其先民活动即已见于史籍；说它年轻，其族别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1957年才被正式承认。”这个话其实是合乎客观实际的。

早在远古时代，其先民巴人即和中原华夏族有着密切的交往。殷墟甲骨文里有五片提到“巴方”。夏禹时代，曾“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巴、蜀当在其列。公元前十一世纪，巴人以勇锐之师，参与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并“歌舞以凌殷人”。春秋之际，巴、楚时有攻伐；战国时、巴、楚通婚，楚平王的母亲就是一位“巴姬”。

“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其后秦置巴郡，但仍“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刘邦为汉王，巴、蜀是他争夺天下的基地，并特别赞赏巴人“锐气善舞”的民风，令乐人学习“武王伐纣之歌”，用以作为宫乐。

汉定天下以后，文翁没学蜀郡，很著成效，汉武帝诏令全国广为推行，由此巴人地区文教大兴。《华阳国志·巴志》：

“自时厥后，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巴志》录有十首无名诗作，就是这种文明开化的结果。试举《刺巴郡郡守诗》以窥豹斑：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
披门出门应，府记欲得钱。
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
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
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
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诗经》、《伐檀》、《硕鼠》是极富人民性的名篇。这首巴人的作品，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在汉代诗坛可算独立不群。全诗让事实说话，诗人的主观感情融化在情景的描绘之中。作品叙写生活的一个片段，脉络清晰，富有戏剧性，尾联似是主人公的呼喊，包容着对于吃人的剥削制度的斥责与控诉，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都不可能均衡同步。《隋书·地理志下》说，在今湘西、鄂西一带及其毗邻地段，曾经“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居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这就说明，民族内部已在分化。那些“与诸华不别”的“蛮夷”，虽然有血统上的特质，却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已经不愿祖述家门了。这就为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造成了困难。在我们从《华阳国志》看到那十首巴诗之后，业经连结并足可纵贯厚厚的一本历史的线头便突然中断了。

唐宋以还，自是人才辈出。单就鄂西恩施一地而言，据《恩施县志》称：“历千余年，皆有学，人材炳蔚，已代有传人矣。”唐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资治通鉴·唐纪》说：“巴酋长子弟，量才授仕。”天宝年间，赵国珍以牂牁酋长后裔身份官至工部尚书（《旧唐书·南蛮下》）。宋元祐三年（1088），生长在恩施道政乡的詹邈考中进士第一，其后，还有向九锡等九人进士及第（《恩施县志》）。这些既能

金榜题名、获得高官厚爵的文人，无疑都曾受过良好的汉文化陶冶，并有较高的造诣。我国古代的仕宦，大都能附庸风雅，吟诗作赋；唐代科举取士，诗艺更是必考项目。遗憾的是直到目前我们尚未找到这些文人学士留下的只字片纸。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贯穿着漫长的积累与承继的过程。从这个意义来看，出现于唐宋时代的土家族文人，固然绝非偶然，而其对于往后土家族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无论是民间的还是文人的，自然要产生积极的影响与推动。

二

明朝定鼎以后，朱元璋下令“诸土司设立县学”（《明一统志》卷六十六），弘治十四年（1501），明孝宗朱祐樞还规定土官子弟凡要承袭土司或其它土职的都必须入学，不入学者，不准承袭（《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这样一些措施，不仅促进了土家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且使土家族地区出现了一些颇有造诣的文人学士。他们汲取汉文学传统的滋养，运用汉文学的艺术形式进行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绩。

然而终因年代久远，载体落后，我们今天仍难见到其作品的全部。留传下来的一鳞半爪，仰赖家谱和铭刻才得以保存至今。这是土家族文学遗产的不幸中的幸事。这些作品是十分珍贵的。

永顺土司王族彭世麟，在其兄彭世麒于明正德元年（1506）带兵外出征伐时，曾代行司职。他的《观音阁钟铭》虽是一首颂诗，却又是一首包含着深隽的哲理思考的咏物诗。诗曰：“维虚有容，厥声斯洪。随其所扣，应之无穷。以启昭昭，以觉梦梦。晨昏之节，永惟茂功。”读着这样的作品，即使是最后

谨的思维方式也不会被诗作的字面含义所限定。有曰咏物诗要求与所咏客体不即不离。直写物象，即使逼真，只能如同说明文字；而若远离真实，则又无所依傍，发挥事出无因。这首钟铭，咏物恰到好处；诱导人们产生的联想却是意韵无穷。

冉天育曾经作过酉阳第二十一世土司。年轻时，他参加了明王朝讨伐建州女真的战争，写了许多边塞诗。《从征辽左经阵亡处举酒酹之》一诗真切感人，甚是耐读：

日惨风更号，千军血一刀。
黄沙平地起，白骨比山高。
国帅生为戮，健儿死亦豪。
裹尸何处所，薄奠付村醪！

在“国帅生为戮”下，作者自注曰：“主兵者以失律论死。”这当是指著名的1619年的萨尔浒之役的败绩。这一仗，杨镐受戮。据《明史·四川土司传》，在援辽战争中，仅酉阳一地，死难者就达1700余人之多。作品注重炼句，文约义丰。全诗风骨凛冽、悲壮淋漓，沉痛哀悼死难同胞的情致显得极为肃穆而凄苦。

冉天育曾将诗作编为《詹詹言集》付梓，谢国榘序曰：“诗全集凡若干首，近体为多。读之，知本名诸生投笔从戎，远体证左。其后还师，泛东海观涛于广陵，溯大江而上。盖矛头盾鼻之艰危，马背船唇之况瘁，托事怀人之感慨，伤今吊古之凄凉，不知凡几，而一一发之于诗，故其诗有雄杰之气，有谈远之音，有飘忽之神，有苍莽之致……”谢氏所见到的冉天育的诗作远比现今存留的要多，据其概述，作品所涉及的生活层面广阔，风格更是多样。

据《宜昌府志》称：“容美司以诗名家，自子寿始。”子寿即田九龄，容美五世土司田世爵第六子，明万历年间补长阳县庠博士、弟子员。著有诗文二十卷，明代“后七子”之一的

吴国伦给他的《紫芝亭诗集》作序。《宜昌府志》说田九龄“天姿洒落，出尘俗外，性耽书史，喜交游，足迹遍两都。所交与唱和者，多当时名士；为诗冲融大雅，声调谐和。”现存诗110多首。据田九龄五世孙田舜年在诗集的“小叙”里所说，这只是原著的第七、第八卷的各半。

田九龄所处时代的文坛，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高潮已经过去，公安派“三袁”在进步思想家李贽的直接影响下，正大张“反复古”的旗帜，声称要“扫时文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质问“古何必高，今何必卑”，提出了“独具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田九龄或受了乡贤理论的濡染。考其作品，虽多有拟古，却不以模仿剿袭为能事，恰恰相反，倒能独出机杼，力求创新。在作品里，显露出接受了屈原、陶潜、李白的深刻影响。他曾一气写了七首七绝《采石怀李白》，倾注了一片钦敬仰慕的深情。

严首升在《田氏一家言叙》里说田九龄的诗作可以“颉颃王（世贞）李（攀龙）”。这话或有过誉之处。但也不尽然。若是就某一相同题材的作品进行比较，也许会觉得严首升的话不是毫无根据。先看田九龄的《吊明妃》：

琵琶声断塞垣春，青冢年年草自新。

何似文姬归万里，胡笳拍尽九边尘。

再看李攀龙的《和聂仪部明妃曲》：

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

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

王昭君和亲的故事，向来就是历代文人墨客热衷吟哦的话题，但一般都把昭君的境遇写得凄凄惨惨戚戚。田九龄凭吊的明妃，却是“胡笳拍尽九边尘”的和平使者。首联烘托出热烈愉悦的气氛，统摄全篇，奠定基调。说昭君虽死，她的坟墓却随季节往复，冬去春来，青草更苏。此中隐寓着具有永恒意义的礼赞。

说她不像蔡琰流落北国，虽已下嫁南匈奴左贤王，却仍不远万里回归中土。昭君为边疆绥靖作出了牺牲，建立了功业，她是民族友好、亲善的象征。李攀龙的作品没有跳出传统的窠臼。在他的笔下，昭君身居漠北，孤寂伶仃，满脸愁容，一腔忧思。她在凛冽的寒风中，骑在马上弹奏琵琶。由于思念故里，魂牵梦绕，以致曲罢徘徊，误将青海的明月，好像是在汉宫赏玩。作品格调低沉，引人无限伤怀。很明显，和《吊明妃》相较，其思想境界就远有逊色了。

田九龄才调高雅、婉转自然的诗作，在土家族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他肇其端，此后，田宗文、田玄、田圭、田珠涛、田甘霖、田舜年诸家相继涌现，人人有集，构成了一个可观的诗人世家，辉映在鄂西的崇山峻岭之中。

三

清政府“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打破了土家族地区土司统治下长期割据所造成的封闭落后状态，结束了土司所规定的不准土民识字读书，甚至“违者罪至族”的愚民政策。伴随着地主经济的迅速发展，“文治日兴，人知向学”，以至即使“寒俭之士，亦以子弟之诵读为重”（《恩施县志》）。由此可见，文化下移的结果，使得土家族地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与传承，出现了一批具有高度汉文化知识的人才。这些才士，大都能吟诗作赋，有的或有专集绣板，在当时文坛即享有盛誉；有的或仕途不达，沦落乡里，以授徒为业，其乖舛穷蹇的命运，使之得以接触下层人民。这里，简单介绍于诗艺卓有成效的彭秋潭、王道、陈汝燮、陈景星、向乃祺等。

彭秋潭（1748—1808），名淑，晚年自号方山居士，湖北长阳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兄皆能诗。著有《秋潭诗集》，收诗六七百首。清人张应昌编《清诗铎》收录了彭氏两首古体歌行。一首七言《摸桩行》，述说盗贼的诡秘与凶残；另一首七言《沔阳道中夜闻邻船语》，描写湖广地区戊戌（1778年）大旱奇荒，皇家发赈济却被贪官污吏克扣、灾民蒙受诬骗的故事。作品假托夜闻邻船所说，款款道来，却淋漓尽致，字里行间，充溢着悲思与愤激。作品所叙写的情景，具有诗史的审美价值。全篇结构虽是顺着事情发展的次序安排，也许由于生活原型确实诡谲多变，以致读来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关于诗创作的理论，彭秋潭亦有独到的见解。在《长阳竹枝词序》和《文江小稿序》中曾有所阐发。他认为诗是“出于自然与不得不然”的产物。境、情、文相递而生。“境”派生出“情”，而“情”的厚薄与贞邪，又决定“文”之高下与雅郑。从诗人对于“情”之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而言，可以认定彭秋潭把住了具有决定价值的艺术特质。就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彭秋潭反对明清以来诗坛流行的“论时代、分家数、尚考据、贵博物”的风气，主张任性自然，不事雕琢，并身体力行，不为所谓“伪体变格”所惑。这些见解都是可取的。但诗人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义之则”，使他陷入了自我矛盾的深坑。从他的这一主张出发，其效果必然是过份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而有损于诗歌的艺术追求。

王道，名国岭，号贯三，湖南永顺县人。约生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死于咸丰年间。县廪生，秋闱失意，未入仕途，不得遂志，终生以教馆糊口。著诗300余首，多同情民命、泄愤遣怀之作。生前即嘱必以诗表其墓，足见于此道之执着。他的《里中有仓粟陈，拒兄弟之贷》诗，揭露一位乡绅不念手足之情的劣迹，很能使人生发“世态炎凉”之慨。这位乡绅的

仓储粮食已经陈腐，兄弟饥馑，前来借贷，却被拒之门外。王道的《瓦雀》七绝颇耐人寻味：“雀携黄口跃相随，啧啧阶除得食时。终日依人檐宇下，怎教鸿鹄志能知？”《史记·陈涉世家》有云：“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诗人也许由此得到启发，即景咏物，仿佛作出解答，实则另有寄寓，意即依人檐宇，难有作为。因为闭塞浅陋，甚至连想也想不到外面的天地还有多么广阔。

陈汝燮，字达泉，号答猿，四川酉阳县人，约生于道光十年（1830）前后，逝于本世纪初。平生作诗900余首，是土家族诗人中存诗最多的一个。晚年将全部诗作汇为《答猿诗集》，陈景星作序，曰：“君少负异禀，文章渊雅，于学无所不窥，平生精力，悉萃于诗。”又说：“余细校君诗，客成都最久，诗亦最多。其登峨嵋、眺雪山及咏怀古迹诸作，苍茫凭吊，横绝一时，后走遂州、游黎雅，泛龚滩延江，复趋成都，所赋古近体，穷搜冥索，觉苍莽盘郁之气，奔赴腕底，铤凿幽险，而出以自然，为近人所未有；其它里居、投赠、咏物各篇，尤为新隽。偶拈一语，则神采欲飞；偶炼一字，则百思不到。合韩、孟、元、白为一手，沉博幽香，愈咀而味愈出。”这一段话，概括地叙述了陈汝燮诗作的各种不同题材及其艺术特色。稍后的王大章在诗集的弁言中也说：“先生淹贯略流，博极群书”；“今读其诗，无美不备，杜子美抑郁悲壮，韩昌黎妥贴排傲，黄涪翁凝重深稳，王介甫突兀折旋，皆兼而赅之。富有千篇，复不苟一字。凡独构之思，奇辟之境，皆有寝馈，有来历，体物工细，声光并茂。”这些话，都不能说毫无根据。诗人在《雨势》一诗里，表达了他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文章最忌是平平，作势留心看雨倾。”他从“雨势”得到了启发，认定作文要有倾雨之势。“倏地雷奔添陡健，入楼风乱助纵横，倒翻江海霖无际，蛰起蛟龙阵有声。”诗人以“雨势”

类比较文，完全符合艺术创作规律。

陈景星，别号笑山，道光十九年（1839），生于四川黔江县，后迁贵州石阡县落籍。陈氏一生，游踪几遍全国的山山水水。在历代土家族诗人群中，陈景星的创作恐怕当推魁首。据估计，大概不会少于一千。他的作品编为《叠岫楼诗草》。诗集是由《壮游集》、《磨铁集》等八集汇编而成，其中《壮游集》曾由业师梓入《二酉英华集》，后经增删刊入《蜀诗所见集》，天津付印。陈景星的诗作多有关心民命的篇什，如《悯旱三首》可以视为代表之作。陈景星于55岁出仕，曾赴齐鲁放赈，后任山东崂山、日照县丞。在广西戎幕参谋文案时，闻讯收复，大败法国侵略者，激动得即席赋诗。然而好景不长，一向投降卖国的慈禧、李鸿章辈，却与战败的侵略者在天津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条约》。诗人目睹统治者丧权辱国的劣迹，在《送友人回黔》一诗中畅述豪慨，引述典籍故事，寄托愤怒难平的激情，痛斥投降派误国，并自勉励人，振奋精神，等待时机，希图有“时来自吐虹”之日。辛亥革命以后，诗人流寓沪上，和名流王闿运、易顺鼎时有过从。他的《感事十四首》，高唱“即覩诸大政，已握治平先”，表达了他对废除帝制、建立民国的革命的竭诚拥护之情。然而，形势陡然逆转，袁世凯逼迫孙中山辞职，自己爬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此时，诗人以《去岁九月十一日余抵沪浹，今年此日为阳历十月十日正式总统受职之期，作此纪事》为题，作诗讽刺。诗曰：“民国完成故国休，年光似水去难留。料知旧苑笙歌里，别有寒鸦噪晚秋。”作品嘲弄袁世凯是“旧苑笙歌里”的一只“寒鸦”，他的粉墨登场，一派喧嚣之势，不过是“鸦噪晚秋”的闹剧罢了。

向乃祺（1884—1954），字伯祥，湖南永顺县人。清末秀才，后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被选为国会议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期间，在重庆主编《宪政旬刊》。建国后，

出任湖南省政府参事。著有《灵溪诗存》上下两集，共700余首。在《求序启》中有云：“予少年受《毛诗》，塾师教以正性情、节哀乐之旨，辄深难解，至读《蒹葭》、《杨柳》之什，兴趣油然。盖心与物交，感而遂通。”应童子试时，“以嫺杜诗获隽”。留学日本，虽“未专声律，而酷好之，故于课余喜作诗”。由此足见诗艺根基深厚。《灵溪诗存》出版后，颇为诗界称道。著名南社诗人田星六说：“气体高华，格调清俊”；“采芷握兰，香满沅湘，发边城之雄秀，振中都之文章。”诗词名家修承浩认为向诗“造诣极深，其结体之洁，选词之隽，以五古为擅胜场，七言对仗工整，其生动开拓处，逼近剑南。”的确，这些赞词，向诗当之无愧。

四

值得突出一说的是“竹枝词”。

土家族诗人和竹枝词似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大都喜欢使用这种较少格律束缚的诗体形式，抒发乡土风习、男女怀恋的体验。

“竹枝词”原即“巴渝辞”。杜甫《奉寄李十五秘书二首》其一：“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说：“竹枝歌，巴渝之遗音。”又杜甫《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之二：“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诗人就其所听到的巴人歌唱，一说“竹枝歌”，一说“巴渝曲”，足见二者为一。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唐代诗人皇甫松的诗题：“《竹枝》（一名《巴渝辞》）”，又清人万树在《词律》里也径直说：“竹枝词，一名巴渝辞”。

如所周知，“竹枝词”正式融入汉文学而成为一种独立的